

# 武昌起义

章开沅編写

# 武昌起义

章开沅編写

中華書局

# 武昌起义

章开沅编写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940毫米 1/32·印张3 13/16·插页2·字数57,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200 定价：0.35元

统一书号：11018·524 / 64.4. 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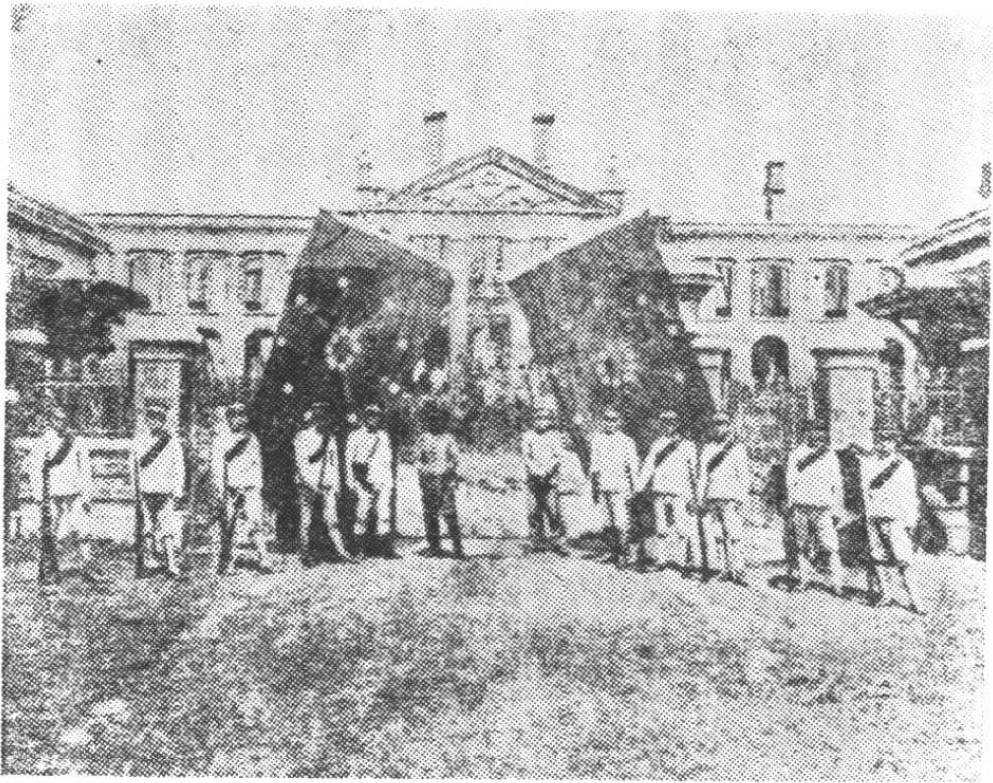
彭楚藩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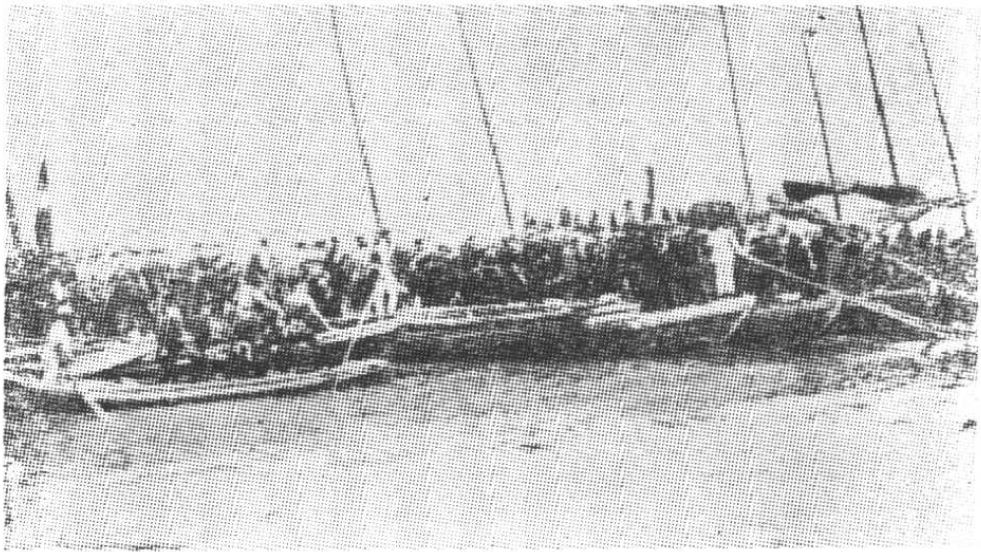
刘复基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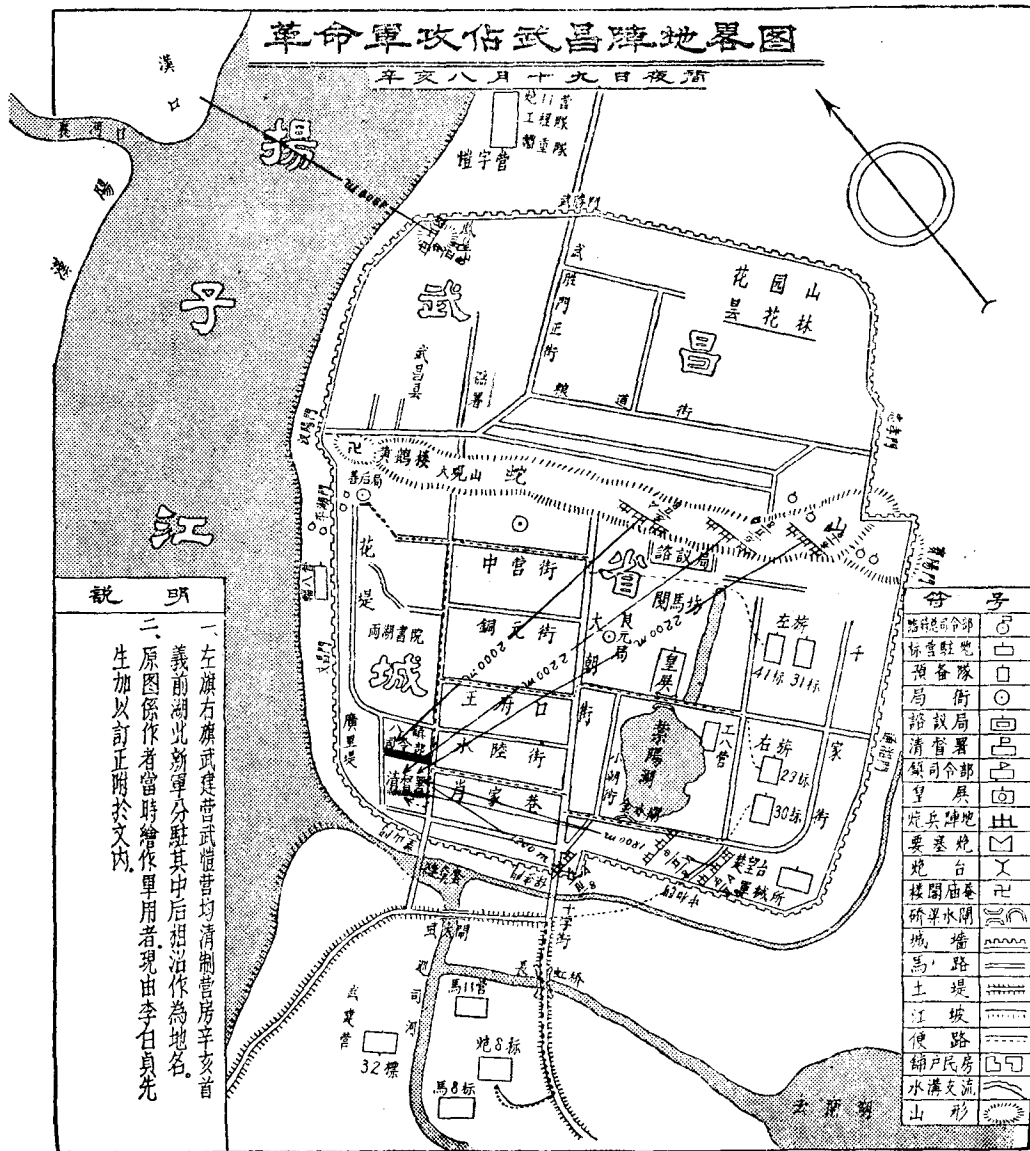
楊洪胜烈士



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軍政府



武昌革命軍渡江作战



(据《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輯)

# 目 录

第一章 革命风暴的酝酿 .....	1
一 武汉成为革命的火山口 .....	1
二 前仆后继的革命先行者 .....	14
三 扎扎实实的宣传组织工作 .....	25
第二章 震动中外的武昌起义 .....	41
一 起义前的紧张准备 .....	41
二 武昌首义和军政府成立 .....	53
三 军政府内部的复杂斗争 .....	74
第三章 激烈的武汉保卫战 .....	92
一 奋战在全国革命的最前线 .....	92
二 湖北地区革命的失败 .....	104
结束语 .....	109
附录一 武昌起义前后大事记 .....	113
附录二 基本参考资料 .....	116

# 第一章 革命风暴的酝酿

## 一 武汉成为革命的火山口

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 在汉水和长江交接之处，龟蛇二山隔江屹立，古老的黄鹤楼和洋式的江汉关遥遥相望，这里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地区——武汉三镇。

武汉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最早而又压迫最深的地区。到二十世纪初年，长江流域已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武汉更成为英、美、日、德、法、俄等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对象，它们都想把这个“九省通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广阔的江面上，来往游弋着外国兵舰；喧闹的港口里，塞满了外国商船。汉口滨江大片土地，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盘踞的租界，那些用花岗石、大理石、水泥、钢筋建筑起来的高楼大厦，都是外国的领事馆、银行、公司、教堂、仓库。矗立在江边的江汉关钟楼，恰像帝国主义凶恶地伸入中国内地的侵略魔爪。

在二十世纪初年，武汉和湖北全省的金融、



工矿、貿易、交通等经济命脉都抓在帝国主义手里。仅仅在武汉地区，各种外国企业就有一百八十家之多。帝国主义把武汉当作向华中地区(实际上还要包括四川、陝西等省)傾銷商品和掠夺原料的侵略中心，所以这里的貿易总額增长得非常迅速。在1898年，汉口的貿易总額还只有53,771,445两，而到1902年便增加到100,321,000两，1910年更增加到152,199,000两<sup>①</sup>。輸入品以棉紗、棉布、棉花、石油、砂糖、紙張等为主，輸出品則主要是茶、皮、油漆、豆、苧麻、药材等，这种掠夺性的貿易，只能給广大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可是，当年有个日本侵略分子却恬不知耻地說：汉口貿易“夙超天津、广东，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壘，使外人艳东洋芝加哥不置”<sup>②</sup>。人們不能不联想到，这个城市的畸形繁荣，包含着多么深沉的亿万中国人民的血泪仇恨。

封建压榨的加重 湖北地区的封建自然经济因为陷入資本主义世界市場而急剧解体，封建統治者不得不加快自身买办化的进程，一則企图通过办工厂、练新軍、設学校来維護自己搖搖欲墜的統治，一則更想借此来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并博取他們的欢心。在湖北办洋务的官員当中，张之洞是最被中外反动統治者器重

的头号人物。从十九世紀最后十年到二十世紀初叶，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內，先后創辦了汉冶萍钢铁公司、紗麻布絲四局和造紙、制布、針釘、毡呢、制砖等厂，同时还設立了商务公所、商务局、商务学堂、两湖劝业場等提倡实业的机构。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当然主要是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統治和加强本集团的实力，但是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資本主义的发展。从1902年到1910年，武汉設立紡织、水电、面粉、火柴、机器等工厂二十四所，在工业发展上仅次于上海。

但是，武汉等少数大中城鎮的畸形繁荣，是建立在广大农村经济衰敝残破的基础之上的；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更促使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在辛丑条約訂立以后，湖北每年上繳国庫的稅捐数额迅速增加，除摊派庚子賠款一百二十万两、鎊亏<sup>③</sup>六十万两以外，还要負担练兵处經費五十三万两，对日“贖还”辽东半島的費用五十万两等等。张之洞等

---

① 徐煥斗：《汉口小志》。

② 水野辛吉：《汉口》。

③ 庚子賠款規定以金鎊为結算单位，帝国主义借口中国以白銀偿还折价时使他們吃亏，要求另行給以补偿。这是賠款正額以外的无耻勒索。

人所办的各项“新政”，和一切腐败封建官僚所举办的事业一样，机构重叠，编制庞大，贪污纳贿，一片混乱，实在都是一些吮吸人民血汗的变相衙门。据后任总督奏报，由于“新政”费用浩繁，湖北人民的税捐负担竟突然超过以前好几倍<sup>①</sup>。这些额外耗费，都化成名目众多的苛捐杂税，例如米谷捐、储备捐、洋油捐、火车捐、食盐加价等等，强加在广大城乡人民的身上。

农村的封建压榨也相应地加强了。随着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湖北很多大地主都直接兼营商业和钱业，从而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的一部分。例如襄阳有个杨姓地主，占地四千亩左右，同时经营钱庄和生漆等行业，而生漆正是帝国主义在湖北大量掠夺的原料之一。这些封建地主除了向农民勒收五成以上的地租和每亩数元的押租以外，还通过放债、贱买贵卖等方式进行残酷的高利贷和商业剥削。大批农民甚至部分小地主因此破产失地，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就像谷城这样的小县，拥有千亩以上田地的大地主竟有三、四十家。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下，农田水利遭到严重的破坏，灾荒因此连年不断。1910年沙洋大堤溃决，受灾农民达数十万人之

多。第二年因为春季雨水太多，潜江、鍾祥、监利等县又遭水灾。“所有受灾之区，一片汪洋，数里不見烟火。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毙者，有掘挖树皮草根以济急者，令人不忍目睹。”<sup>②</sup>

灾民飢苦不堪，大批流入城市，汉口一时曾聚集二十万人之多。农民的流离失所，造成城市人口的畸形膨脹，更加扩大了城市的失业大軍。据《湖北官报》統計：“武汉三市的工厂，使用的职工数不下三万人。特别是百貨集中地汉口，……苦力据說达九、十万人。”所謂苦力，主要是交通運輸工人。他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把头和本国商人的重重压迫、剝削，而且很多处在失业、半失业状态，成为城市人口当中最为貧苦的一部分。

这些成千上万的城乡破产失业的劳苦大众，一部分补充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場的需要，一部分投入新軍营伍，但多数仍然求生无路，经常处在飢餓死亡的边缘。长江流域传统的哥老会及其支派江湖会、孝义会等等秘密会社于是获得源源不絕的后备力量，成为反动統治者所最害怕的社会“隐患”。

① 《湖北通志》卷53。

② 《国风报》，第2年第12期。

雄厚的革命群众基础 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都显得特别不平衡。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中下游，是帝国主义侵入最早而又压迫最深的地区，封建自然经济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比其他地区迅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往往比其他地区更为深刻，而各种进步思潮和革命力量又常常在这里汇集，因此在近代历史上，两广、江浙、两湖，很自然地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

湖北人民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即曾英勇地反抗过英、美商人输入的鸦片毒物，推动了林则徐执行坚决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对策。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三占武昌，四克汉阳，在湖北人民中间留下了深远的革命影响。太平天国失败后，以各种失业贫民、散兵游勇和交通运输工人为骨干的哥老会势力，在长江和汉水沿岸飞快地发展起来。由于外国教会、教士积极充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深入内地，穷凶极恶地直接欺压中国人民，于是会党便很自然地成为反洋教斗争的活跃力量。甲午中日战争前后，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蓬勃发展，湖北一带（特别是鄂东地区）的反洋教斗争也迅速推向最高峰，其中著名的鄂西长阳、武峰的向

策安起义，就是以江湖会为主力发动的。到义和团武装反抗瓜分时期，湖北的反洋教斗争更扩大到蕲州、黄梅、广济、随州、襄阳、谷城、枣阳、施南等地，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在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停止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转而通过清朝统治者，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国内的阶级矛盾显得特别尖锐，会党和其他下层群众的主要斗争锋芒，又逐渐转移到封建统治者身上。抗粮抗捐、抢米暴动、保路风潮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反清斗争，席卷武汉、宜昌、沙市、新堤、崇阳、圻水、黄梅、武穴、沔阳、归州、宜城、光化各地，声势极为浩大。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也很不平衡。长江、汉水和京汉铁路，好像是纵横贯通全省的三条大动脉，而鄂东武汉，武穴一带，鄂西宜昌、沙市一带和鄂北襄樊、光化一带，不仅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势力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浪潮很自然地汇集的地区。湖北人民的斗争长期以来形成这样三个中心，并且和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等邻近地区的人民斗争激荡渗透。在辛亥革命前夜，江浙、湖

南、广东、四川等省的拒法、拒俄、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利等爱国运动，和抗捐、抗税、抗粮、抢米等反清斗争，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席卷川、鄂、湘、粤四省的保路大风潮，更是声息相通，联成一片。各地人民反抗斗争的风起云涌，给辛亥革命在客观上提供了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

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和其他地区一样，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基本群众，大多是穷困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各种城市贫民，他们在旧式会党的领导或影响下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暴虐统治。例如，在1910年春夏之交，湖北很多地方都发生抢米风潮。武穴饥民向囤积居奇的米店整整斗争了两天，壅坏的贫苦群众也闻风而起。同时，崇阳饥民把商人贩运的粮食拦抢一空，反动知县出面镇压，群众立即围攻县衙门，打毁二堂，夺回被拘捕的伙伴，并且还捉走吏役两人。稍后，沔阳饥民一千多人聚众起事，向反动军队展开武装斗争，使湖广总督瑞澂等反动官员大为震惊。但是这些斗争除了“灭洋”、“反清”而外，提不出更为进步的革命纲领，分散性更是它们的致命弱点，所以总是被反动势力各个击败。会党成分复杂，其中最活跃的是各种各样的游民，因此容易变质，而且

往往帶有很大破壞性，不可能引導群眾鬥爭取得最後勝利。

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并且把各种各样的反抗力量聚集到新的革命轨道上来。

由于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武汉一带已经出现了几万产业工人。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三重压迫，生活最为困苦。每天工作十一小时到十三小时，劳动条件极为恶劣，而且动辄遭到工头竹片、笞杖的苛毒殴打。工资极为低下，简直无法维持家庭生活。如果发生工伤事故，轻则残废，重则丧命，根本没有劳工保护法提供任何保障。像武汉附近马鞍山煤矿一次炸药爆炸，当场轰死运煤工人七、八十名，还有散工伤亡不计其数。正因为所受压迫最深，他们的斗争也最为坚决，并且表现出较好的组织性。1907年汉口铜币局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而举行罢工。1909年外商顺丰、阜昌等砖茶厂工人，为反对工头盘剥和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八、九千人的同盟罢工，几乎发展成为暴动。在1911年保路风潮中，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也曾经举行暴动相配合。但是，当时的产业工人还是自在的阶级，他们的反抗大多局限于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而且往往只能利



用落后的帮会组织，无从根除小生产者涣散、狭隘等弱点的影响，因此只能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国内其他地区比较，仅仅次于上海；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摧残，他们不仅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经常遭受衰败破产的严重威胁。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武汉的畸形繁荣，主要表现在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所需要的商业方面，至于民族近代工业的基础，实在微弱得可怜。翻开民国初年编印的《夏口县志》<sup>①</sup>，当年商户分类调查表记载：钱铺329个，匹头绸缎铺188个，包头丝线行店125个，衣庄227个，……，真是应有尽有，发达之至。相形之下，近代工业数量既少，又残缺不全。无怪乎这本县志的编者慨叹：“甚矣哉！实业之难言也。吾夏口为商业繁盛之区，而所谓实业，不过如此。此外大半为外人所置，或托庇于外人之宇下，例不得书。亦有实系吾国人所经营，而资本甚微，兴废无常，则又书之不胜书。此以见吾国人营业力之薄弱也。”<sup>②</sup>民族资产阶级渴望自身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因而也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要求，曾经比较踊跃地参加或响应历次抵制外货和保路风潮等斗争。但是，他们一